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出京，任江州司马时的感怀之作。后世读诗之人大多为诗中琵琶女高超的技艺折服，被诗人善感忧世的心境所触动。至于他因何被贬却少有人关注了。其实，这首诗的背后，隐藏了一段大唐历史上的惊天血案和宰相武元衡的故事。

唐代诗人宰相武元衡

入蜀7年留下大量唱和之作



武元衡像。

武元衡遇刺与削藩有关

815年(唐元和十年)6月3日清晨，天还未亮，当朝宰相武元衡乘轿上早朝。当车轿走到靖安坊东门时，突然从路边闪出一群凶徒将武元衡杀死。与此同时，大唐的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裴度也遭到凶徒袭击。裴度被砍三刀，身负重伤。

案发后凶手逃之夭夭。直到武元衡的马走到朝堂，大家才知宰相已遇害。唐宪宗闻报震惊至极，不胜哀恸，下令全力追捕凶手。但数日过去一无所获。恐怖笼罩着京城，众臣人心惶惶。

宪宗心里明白，宰相之死与他正全力开展的强硬削藩有关，此时他正雄心勃勃以图重振中央政府的权威，而武元衡和裴度正是积极支持者。尤其武元衡性格倔强刚烈，是朝廷里最为强硬的主战派，得宪宗信任拜相之后，主持所有兵事。就在前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武元衡力排众议，倾全国兵力讨伐。兵精粮足的淮西镇与朝廷的军队整整打了8个月，仍没见胜负。就在此时，凶案发生了。朝廷内胆小之人请求罢免裴度，以安抚强藩。此议遭宪宗怒斥，他提升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委以重任，继续削藩。四年后，淮西、成德、淄青三个强藩被平，造就唐晚期短暂的“元和中兴”。武元衡以一己身死实践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激励后人，也可谓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白居易上疏缉凶因言获罪

那此事又如何与白居易扯上了关系？事件发生时，白居易在朝中任“官官”，即太子官内的官，并无实职。他首先向宪宗上疏，请求迅速逮捕凶犯，以雪国耻。

《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官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诋毁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真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被贬江州，直接起因就是因为上疏请求急捕杀害武元衡的凶徒。按说，以宪宗对武元衡的倚重，此举并无不妥，而白居易居然因言获罪，可见此中复杂的政治局势。唐晚期的朝政早已积弊已久，纵使宪宗有意振作，但自身局限、左支右绌的情状仍然可见一斑。

自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越来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

宪宗元和年间，宰相为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等人。武积极主战，主张用兵讨平叛乱，不能姑息养奸，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张用兵，这两人深得宪宗信任和支持。而张弘靖、韦贯之主张息事宁人，属于绥抚派。白居易上书要求缉拿凶犯，遭到张、韦等人的不满，于是说他“官官不当先谏官言事”。这条莫须有的罪名，还不算很严重。于是，“素恶居易者”又捏造事实，以“伤名教”罗织罪名。所谓“伤名教”，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哪还能作官呢？这真正是一桩冤案。从现存的白集看，没有新井诗，宋代人也没有看见新井诗；而元和六年白母卒后至九年补官前，白居易在丁母忧期间的诗作，大都悲伤哀痛，根本没有赏花诗。

白居易后来在写给亲友的信中无奈而沉痛地说起此事，他之所以获罪，盖源于“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诗歌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诚也”，即他以平易而深诚的诗文表达政见，并且奏报给皇帝，他的特立独行让那些趋炎附势之人极不舒服。以此招致中伤也就不奇怪了。

就这样，白居易在江州整整待了四年。此后他的政治热情逐渐减退。江州司马泪湿青衫，为人也为己。

与薛涛诗文唱和往来密切

武元衡(758年—815年)，字伯苍，出身于世家，为武则天曾侄孙。《新唐书》记载，唐德宗十分欣赏他的才干，曾一年内将他连升三级。在朝堂上目送武元衡的背影，唐德宗曾感慨道：“元衡真宰相器也。”有唐一代，名相辈出，而武元衡可以说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位。不仅因为他的才干风度和名震晚唐的诗名，也因为他俊雅洒脱的外貌，更因为他刚烈铁血的悲壮结局。

安史之乱后，四川重镇历来有“宰相

回翔之地”的名声，以宰相出掌西川节度使的不乏其人，武元衡即为其中卓越之人。从元和二年到元和八年，在武元衡横遭惨祸的前七年，他一直生活在成都。他在成都遇到了正值盛年的薛涛。

薛涛卓尔不凡的才华、谜一样的人生和奇崛峭拔的灵魂，让当时诸多文人雅士倾倒。后人说到她与历任西川幕府的交往，多会言及韦皋、元稹等，但在武元衡治蜀的七年中，他们注定要留下一段故事。

武元衡初入蜀，仅睹及蜀道已有“路半嘉陵头已白”之叹，感慨蜀道之难，亦隐喻治蜀之难。

蜀地自韦皋以来已养成了诗酒花韵、召伎宴饮的官场习气，即席赋诗对于文采风流的武元衡来说不是难事，但持身甚正的他并不喜欢这种浮华风气。《新唐书》说他“雅性庄重，然淡于接物”，就是说他不喜欢应酬。一次宴席上，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淡淡一笑，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终不让宴会不欢而散。

在宴席中，薛涛作诗一首《续嘉陵驿诗献武相国》：蜀门西更上青天，强为公歌蜀国弦。卓氏长卿称士女，锦江玉垒献山川。告诉武元衡，蜀地不仅山川峻秀，而且人物俊雅风流，一如卓氏、长卿。初见此诗，武元衡即被薛涛的诗文表现出的非凡气魄折服。

在写给薛涛的《听歌》里，武元衡流露出遇到知音的喜悦和赞美：月上重楼丝管秋，佳人夜唱古梁州。满堂谁是知音者，不惜千金与莫愁。几番往来唱和，武元衡与薛涛关系逐渐密切。大约在元和三年(808年)，武元衡因看重薛涛的才华，向朝中表奏授薛涛校书之职。校书郎官阶虽不高，却是令天下文人艳羡不已的职位。但当时官方授予

的“校书郎”，得经过科举考试才行。所以，很大可能薛涛当时是武元衡私下聘请的“校书郎”。

达宦而诗工者惟元衡

曾有人评价说：“工诗而宦达者惟高适，达宦而诗工者惟元衡。”也就是说诗人里做了高官的只有高适，高官里成了诗人的只有武元衡。能够这样评价武元衡，其诗情定不止于只为附庸风雅业余爱好那么简单。晚唐诗人张为曾在《诗人主客图》中评价武元衡的诗为“瑰奇美丽主”。今存《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共191首，其中有近40首都是武元衡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创作的，说明在蜀时期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阶段。

因为雅好诗文，武元衡早年在京任职就与同僚们多有酬唱。在蜀七年中，以他为中心的幕僚群体更是举行了不少诗会活动。武元衡入蜀的第二年(元和三年)春，就建造了“西亭”，作为与幕僚诗文唱和、宴会活动的场地。这个西亭现已不存，但揣摩其意，能看到山峰，似乎应该在城西之外。

摩河池也是武元衡迷恋的地方，他在《摩河池宴》中这样描绘池上的春日美景：摩河池上春光早，爱水看花日日来。秣李雪开歌扇掩，绿杨风动舞腰回。芜台事往空留恨，金谷时危悟惜才。昼短欲将清夜继，西园自有月裴回。

除了诗会活动中留下大量唱和之作外，武元衡还写了不少描绘蜀中景色的诗作。如“鸟道青冥外，风泉洞壑间”刻画蜀地山水相间的典型风貌；“万里水连天，巴江暮云碧”写出蜀地江水波澜壮阔声势浩大；“悠悠风旗绕山川，山驿空蒙雨似烟”描绘了蜀地青山翠峦、暮雨纷纷的朦胧美……这些诗歌颇具蜀中特色，体现了当时巴蜀的地域风貌。与此同时，这类诗歌还融入了一名将帅出入蜀中的豪情壮志。如《兵行褒斜谷作》中“集旅布嵌谷，驱马历层洞”展现了军容整齐威武的画面；“矢囊孤室岂领军，僭爵食禄由从宦。注意奏凯赴都畿，速令提兵还石坂。三川顿使气象清，卖刀买犊消忧患”则表达了希望能平叛西蜀立下军功的雄心壮志；“捧刀金锡字，归马玉连环。威风翔双阙，征夫纵百蛮”更是一展将帅豪情。

武元衡在蜀中的创作和唱和，对当时蜀中诗歌创作和文学风气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蜀地独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气息也给这位大唐宰相的人生增添了一层温柔浪漫色彩。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14年，位于成都后子门的摩河池遗址重见天日。本报资料图片